

“全球化一本土化”語境中 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

毛思慧

[提要]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不同語文之間的語言符號轉換，更重要的是兩個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層次交流。面對外國的文學作品（如小說、戲劇）和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翻譯不僅是一個多方位多層次理解、比較、構建文本的語言過程，更是一個反復閱讀、不斷選擇、重新寫作文本的文化過程。我們既帶著母語和自己的文化閱讀或“誤讀”外國文本，也在翻譯的過程中對這些文本進行各種語言處理和文化選擇或剪輯。文化翻譯的終極目標不僅是幫助一個民族構建、協調、整合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身份，而且從根本上挑戰甚至糾正他人對自己的歷史誤讀和文化偏見。在“全球化一本土化”時代，我們應更深入地探討後殖民主義文學、文化與翻譯研究史上輝煌的理論遺產。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現實中的西方後現代主義話語，為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翻譯工作者提供的絕非現實意義上的文化多元或新的獨立身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探討這一“全球化一本土化”命題空間裡的文化翻譯及建立各自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本文將重點討論“全球化一本土化”語境中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應特別注意的四個策略。

[關鍵詞] 全球化一本土化 後殖民研究 文化翻譯 文本重寫 文化身份 策略

[中圖分類號]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2 - 0191 - 11

前言

在《凌志汽車與橄欖樹：理解全球化》一書中，弗里德曼寫道：“Globalization has a distinctly American face: It wears Mickey Mouse ears, it eats Big Macs, it drinks Coke or Pepsi and it does its computing on an IBM or Apple laptop, using Windows 98, with an Intel Pentium II processor and a network link from Cisco Systems.”^①其中文大意是：“全球化有一張明顯的美國臉孔：它長著米老鼠的耳朵，大啃麥當勞巨無霸，暢飲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操作 IBM 或蘋果電腦，使用視窗 98 操作系統，搭配英特爾奔騰 II 處理器，並使用思科系統進行網絡連線。”十幾年過去了，雖然在科學和技術層面已今非昔比，但全球化的實質沒有大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依舊引領全球化

潮流，繼續制定著全球的各種“標準”和“原則”。

也許，我們可以暫時擱置“全球化是否等於美國化”或“全球化是否就是全盤西化”等問題，但作為文化翻譯研究工作者，我們必須探索並回答這樣幾個問題：（1）全球化意味著科技、管理、交易、交流方式的“標準化”，誰的標準？（2）全球化同時意味著“共有或共用”的“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這是誰的文化？它的核心又是什麼？（3）全球化往往在“我們都住地球村”的堂皇敘事中把歐美價值當作“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與傳統將如何保持繼續發展或至少不被那些歐美價值淹沒或邊緣化？本人認為，在我們的文化翻譯研究中發現並挑戰外來文學文化產品中的歐美民族中心主義至關重要。

歐美民族中心主義與近幾百年來的種族主義、歷史偏見、性別歧視、殖民現實和文化霸權密切相關。如果我們在比較文學文化和翻譯研究中要對它進行反思並進而思考我們新的文化價值取向，就必須在展示歐美主流“知識形態”（forms of knowledge）內在矛盾的同時，在翻譯研究工作者中培植發展作為文化抵抗的閱讀和翻譯策略。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宏觀把握，任何孤立的、微觀的“細讀”（close reading）都將失去應有的意義。在“全球化一本土化”時代，我們應更深入地探討後殖民主義文學、文化與翻譯研究史上為我們留下輝煌理論遺產的法農（Frantz Fanon）、賽義德（Edward Said）、霍爾（Stuart Hall）、巴巴（Homi Bhabha）、胡克斯（bell hooks）和茲奧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r）及其對中國文化翻譯研究者的啟示，以期找到符合我們言說和發展的平衡點，進而構建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後殖民文化空間。

“全球化一本土化”時代的後殖民文化翻譯空間

我們知道，“全球化一本土化”一詞譯自英文合成詞“Glocalisation”（台灣譯成“全球在地化”），源於“全球化或環球化——Globalisation”和“本地化——Localisation”兩個概念。它首先出現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跨國公司的商務運作及管理實踐：一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的產品或服務，雖然都以行銷全球並獲得最大利潤為目的，但會因為當地的市場作改變，以符合本地的文化。而真正在英語國家學術界流行起來則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由英國社會學家羅伯遜在著名論文“全球化一本土化：時—空與同質—異質”裡第一次提出並應用於對當代世界新現實、新秩序、新未來的分析之中。^②在我看來，“全球化”和“本土化”兩者間存在既依賴又自主的關係。也就是說，“地球村的人”要學著如何與來自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他者”共存，而“共存”就意味著權力關係。

“全球化一本土化”清晰地涵蓋了當今世界範圍內東、西、南、北之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種族等各種勢力相互依靠又相互制衡的極其複雜的現實。簡要地說，“全球化一本土化”強調世界經濟、文化的一體化/全球化與回歸民族傳統、復興民族文化與經濟、實現民族認同的“本土化”這兩種進程的動態辯證關係。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統治下的金融、生產、貿易一體化，知識經濟條件下的信息化、數碼化、網絡化。全球化帶來的空間重塑必然推進我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心理諸方面的急速變化，這就迫使我們以本土特色和實際需求為本，尋求應對策略，制定發展方向。正如丁仁方在《全球化與新地方主義》一文中所論述的那樣，“當全球化衝擊之時，可依尋地方的優勢進行調整，以鞏固其主體性與發展空間，但也必須兼顧全球化的脈絡與變遷。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唯有掌握‘普遍性特殊化’與‘特殊性普遍化’之雙向原則，方能制定出最具效益的發展策略。”^③

然而，由於東西方（或曰“南北”）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持續性不平衡、不平等，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全球化一本土化”的雙重交流/交融中，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仍然在信息、知識、語言、符號、意識形態、科技產品等的設計、製造、出口及利益獲取的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壓倒“亞、非、拉”等區域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這裡我們以當代英美媒體的代表 CNN 和 BBC 為例。現在，CNN 利用全球衛星傳輸系統向世界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5 億個家庭近 5 億觀眾播送節目，向 260 多個廣播電視臺提供新聞和信息，擁有 600 多個附屬廣播電臺，在美國本土以外擁有 40 多個分部，它的國際新聞報導中的一半由設在倫敦和香港的分部製作。^④因此，我們說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符號帝國”。英國 BBC WORLD 電視新聞頻道更是 24 小時不停播放，理所當然地成了“Global BBC”。他們極力淡化媒體的官方色彩，標榜和推行“獨立”（independence）、“客觀”（objectivity）、“準確”（accuracy）、“公正”（impartiality）的基本價值和原則。BBC 的口號是：“新聞放第一”（Putting news first）。其視點超越英國本土，立足於與英國本土、國際、覆蓋地域關係密切的新聞上，即選擇“廣義的國際新聞”，採取“非本國新聞主義”之路線，在全球化進程中注重節目的本土化，淡化甚至“消除”BBC 大英文化帝國式的操控，努力塑造“全球化一本土化”電視新聞的形象。然而，我們在審視“全球化一本土化”時代信息、知識、語言、符號、意識形態、科技產品、移民/人才等等的流向時，從事翻譯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必須審視考察文本/產品之意義的生產和合法化的複雜過程。不管 CNN 和 BBC 的新聞製作和報導如何“客觀、公正”，不管歐美文化如何在“民主、自由”的旗幟下搭建無邊無際的、擁有“環球知識”的符號帝國，在面對“全球化一本土化”時代所帶來的認知、技術、身份認同上的挑戰時，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以下兩點：

第一，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種現實意義上的經濟操控和文化霸權在未來若干年不僅將繼續存在，而且將使一些長期被邊緣化的民族和文化走向衰落甚至滅亡。由於“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從未像今天的世界那樣得到徹底的運用，西方文化的霸權勢不可擋、無孔不入，因此，在文化翻譯的空間裡，弱勢文化、邊緣文化、非歐美文化的抵抗才顯得更加重要。

第二，有的學者（如張學昕）說“全球化”是我們的文化選擇^⑤，本人認為“全球化”並非我們的主觀、自由選擇，而是我們面臨的空前挑戰；“本土化”是我們近乎本能的反應；全球化和本土化之融合才是我們理智的戰略選擇。

因此，我們只有從“全球化一本土化”的全方位平衡著眼，充分瞭解並謙虛地學習發達國家與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人文的社會、政治、經濟、管理制度，同時依據豐富的本土實踐，建構獨立的理論和話語體系，在世界經濟、金融、文化、信息一體化的大潮中，以創造性地話語和東方智慧展現在世人面前。張京媛在談到中國大陸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者的“處境”時這樣寫道：“當代文學批評話語並不是通用的、毫無民族區別的、非政治的和中立的，不能簡單從一個語境移植到另一個語境。使用後殖民論述的術語與方法，也有複製或重複後殖民理論所批判對象的邏輯和認可其權力範圍的危險。我們需要辨別這種批評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基礎以及產生的社會和歷史語境，也要研究我們與殖民話語策略的關係。我們不能重複殖民者的邏輯，簡單地把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用基於同一邏輯的另一種霸權取代西方霸權。這實際上恰恰意味著西方成功地用‘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了當地文化，即‘他者’”。^⑥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過去用來對我們的世界進行認知分類的“工具”以及所產生的各種“知識”面臨空前的挑戰和危機，以歐美為主導

的強勢文化也遠不如過去那麼悠然自得而不受“他者”的質疑甚至否定。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為當代人文社科研究者提供了在“全球化一本土化”語境下既挑戰他人又反思自我的一套話語體系。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在這樣的雙向反思中，在總體上仍舊是集權主義的中國儒家文化傳統與標榜自由、民主、法制的、骨子裡仍然擺脫不了民族中心主義的歐美現代性之間，找到符合我們文化翻譯研究言說和發展的平衡點，進而構建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後殖民文化翻譯研究的空間。

面對外國的文學作品（如小說、戲劇）和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翻譯不僅是一個多方位多層次理解、比較、構建文本的語言過程，更是一個反復閱讀、不斷選擇、重新寫作文本的文化過程。⁹我們既帶著母語和自己的文化閱讀（有時可能“誤讀”）外國文本，也在翻譯的全過程中或對這些文本進行紳士般的“信達雅”處理，或浪漫的隨心所欲，或近乎霸權的道德剪輯。從近兩千年前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安息人安世高對《安般守意經》等三十餘部佛經的個體翻譯，到唐朝玄奘從西天取經回來後主持規模空前的譯場；從明代萬曆年間徐光啟與義大利人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策量法義》等西學經典，到晚清“新學”時期梁啟超、林紓、嚴復等對西方數百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學、藝術的譯介（包括極具特色的意譯、節譯、刪改、重寫、合譯、編譯等）；從“五四”運動之後以瞿秋白、魯迅等為代表在“新文化”背景下掀起的包括譯介馬列經典、英法現實主義和俄國“無產階級文學”在內的“文學革命”，到 1949 年建國以後在“革命文藝”主流意識形態制約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旨在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守式選譯；從“文革”時期反文化反傳統的閹割式外譯漢和霸權式漢譯外，到改革開放以來國人渴望現代文明、“擁抱”西洋文化、近似流行性感冒和趕廟會那般的豪、狂、濫譯，我們不僅可以說，中國文化的曲折發展和獨特變化都與翻譯息息相關；我們還可以說，沒有翻譯，國人的精神家園是會貧瘠許多的。雖然有的翻譯是在製造文字垃圾，但通過眾多譯者若干世紀的外譯漢和漢譯外，國人不僅加深了對民族自身和他人的認識，翻譯帶來的跨文化交流與融合還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知識結構和文化心理。也就是說，我們的翻譯拓寬了自身的文化視野，而文化的進步和跨文化交流意識的提高，又為我們提供了更廣闊的翻譯實踐和文化翻譯研究的空間。

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的四大策略

從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及變化角度來看，似乎可以做這樣的表述：翻譯讓我們更了解他人，也更了解自己。沒有翻譯，就沒有今天開放的文化中國。然而，我們必須明白，今天全球化主流話語在構建“天下文化是一家”的地球村新神話的過程中，隱蔽而巧妙地完成了一次對歐美民族中心主義的複製。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只好讓自己繼續受控於歐美民族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借用福柯式的“權力與抵抗”論述，一方面用“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質疑歐美中心主義“神聖”的主體定位，動搖其“完善”的權力結構，解剖其“堂皇”的主流敘述；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認識“多元文化論”在“你我平等、文化並存”旗幟後面所隱含的“依然故我、奈我不得”的歐美文化霸權。好萊塢從來不曾禁止別人拍片，然而誰能與之抗衡呢？它不僅稱霸於世界電影市場，而且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國）主流思想文化再生產的超級加工場。我們深知，歐美民族中心主義與進幾百年來的種族主義、歷史偏見、性別歧視、殖民現實和文化霸權密切相關。要對它進行反思並進而思考我們新的文化價值取向，必須在展示歐美主

流“知識形態”（forms of knowledge）的內在矛盾之同時，在翻譯研究者中培植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

這裡首先要說明的是，“抵抗”（resistance）不是“拒絕”（rejection），它只是一種有審視意識的立場。我們有時很容易盲目樂觀，只注意到事物的一方面，過於喜歡全球化一本本地化時代的那種泛文化、反傳統、挑戰秩序、消解神聖、彌滅等級的“新姿態”，甚至認為它從根本上暴露並動搖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的內在矛盾，“可以給人以反省，從而重新走上更合理的社會形式，建立更健康的文化品格”^⑥。然而，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現實中的西方主流話語為非歐美（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翻譯者提供的絕非現實意義上的文化多元或獨立身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探討這一“全球化”命題的空間並建立各自文化身份的某種可能性。也許經濟、文化全球化最讓我們認可的一點就是它對“多元性”（multiplicities）的關注和認可。至少在話語層面上，它強調“複數形式”的種族、文化、性別、真理、現實、性欲、理性等等，反對任何壓制它者的霸權。近百年多年來的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差異和文化誤讀在任何跨政治地域（南與北）、跨文化（東與西）、跨種族（白與黑與黃）、跨性別（男與女/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情景中都存在，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石的極端民族中心主義往往“自戀”本國文化又“意淫”外國文化，無視世界各個文化體系之間的差異。我認為，在全球化一本本地化文化語境中，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應當特別注意我們的種種策略。

在本人看來，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既有宏觀的文化理論層面，亦有具體的翻譯選擇和翻譯批評的微觀層面。以下分四點進行簡要論述。

（一）在文化翻譯研究中強化“文化多元”意識，拒絕進入世界文化單一化陷阱

二十世紀最深刻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時刻警惕任何以種族中心主義為基點的殖民統治、經濟侵略和文化霸權。人類的“進化”歷史似乎很悠久，然而人的“理性”仍然十分有限，“他”的行為總是結果難測：兩次世界大戰幾乎使人們完全喪失物質和精神的家園。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霸權式擴張使“我們”的這個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在政治權利的分配、物質財富的擁有、軍事能力的大小、知識與文化的生產、流通、消費等方面，差距無可挽回地進一步擴大，傳統的西方軍事政治的直接殖民在全球化的今天又以各種新的形式出現。比如，西方發明的巨額外債和跨國公司使亞非拉不少國家在“全球一體化”的新神話裡得到的是“永遠還不清的債務”。^⑦1997/1998年度，美國以在國際貨幣資金組織擁有的否決權向陷入金融危機的韓國、印尼等國施加霸權高壓，讓人更痛切地感到，“這個世界始終是強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後還是如此。”^⑧西方殖民主義“遺產”是一頭仍在吞噬“它者文化”精神的怪獸，它誘惑或迫使被殖民者走單一的“西方之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只要第三世界的國家期望“現代化”（它們似乎別無選擇，雖然各有各的艱難與不幸），它們都不同程度地被迫以犧牲或損害民族經濟利益或文化屬性為代價進入西方的遊戲規則之中。^⑨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和經濟的“全球化”往往是“西方化”“美國化”的代名詞，“地球村”懸掛的是無數顯形或隱形的星條旗。席柏爾在“西元二千年研討會”上指出：

由於自由民主社會是市場導向的，它可能是一個享有經濟繁榮的世界。不過，遺憾的是，這也意味著社會的同質性將相對提高：過去四十年的歷史顯示，自由民主社會愈來愈美國化了……無論在服裝、音樂、事物、農業、製造業、[銷]售與零售業，以及其他許多方面，世界逐漸變得單一化。植物學家告訴我們，當一個地區只剩下一種植

物，它的體質將變得脆弱不堪，極易感染疾病與蟲害。單一文化對於世界文化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論那是美國文化、瑞典文化、中國文化或捷克文化。^②

在眾多發展中國家仍舊被生存與發展問題所困擾時，東方主義的現代話語本質上還是一種源於殖民時代的權利敘述，一種“否認、壓制或歪曲”其他思維體系文化語境的“長久趨勢”^③。我們應提醒自己，縱觀當今世界的地緣政治和種種經濟、宗教、文化衝突，“世界大同”只是一個童話般的夢想。而文化翻譯研究所提倡的把翻譯看成是“跨語言的文化交流和跨種族的文化身份構建”^④的主張，將無疑提高我們的“多元文化”意識，在“全球化一本地化”的文化翻譯實踐中拒絕進入世界文化單一化的陷阱。我們的文化翻譯的跨文化“願景”其實就是不同種族之間的文化平等和相互融合，反對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權，抵抗那些顯性的和隱性的以歐美中心主義為基礎的標準。1993年的《曼谷宣言》就是質疑西方人權道德標準適用性的一個很好的例證。^⑤1993年6月，聯合國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中，西方國家與第三世界人權觀點嚴重對立，以中國、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為首的亞洲國家提出了人權的亞洲觀念，主張在文化平等的基礎上，國家的發展權利應優先於個人主義，並義正嚴詞地抨擊了西式人權的普遍性主張。

（二）重新認識翻譯中的“文化誤讀”問題

樂黛雲在《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一文中，簡要論述歷史上對待這種差異性的三種不同態度：第一種是將其斥為異端進而同化之；第二種是承認其價值，但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殼；第三種是讚賞不同文化多元共存的相對主義。樂文指出，由於文化的差異性，當兩種文化接觸時，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誤讀。這裡，我們要注意文化“誤讀”的諸多方面：第一，人們的“視域”決定了他們對另一種文化的選擇、切割、認知和解釋，象閱讀和翻譯外國文本這種跨文化活動，要真正超越自身的文化、徹底消解民族中心主義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文化間的相互“誤讀”是客觀存在的，我們應正視它。第二，“誤讀”不一定就是“歪曲”或“閹割”，它往往在文化發展中具有某種推動作用，比如當年茅盾對尼采“向權利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誤讀，把德意志強大帝國的“向意志”，即“佔領和征服”，解讀為五四時期病弱中國必須認同的“向意志”，即“反佔領和反征服”。這樣的誤讀，“一方面豐富了主體文化，另一方面又從完全不同的角度擴展了客觀文化的應有範圍和解讀方式”^⑥。第三，“誤讀”往往比“正讀”普遍得多，它可能發生在任何“跨話語”（inter-discourse）的場景：本土對海外、現代對古代、今天對昨天、男人對女人、權貴對百姓、長輩對晚輩、南對北、東對西、甲方對乙方。第四，在多數情況下，它對文化的浪漫“誤讀”意味著對本文化的某種批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英國、日本及其他一些國家的許多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對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誤讀”就隱含著對本國（資本主義）文化的焦慮和不滿。第五，誤讀有時可能造成相當嚴重的“悲劇性後果”。比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啟超對西方文化危機的解讀，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大聲疾呼要以中國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質疲憊”。“結果並未拯救了別人，倒是國內崇奉國粹，熱心復古的浪潮大大盛行起來，延緩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⑦總而言之，我們要理性地看待文化翻譯中的“文化誤讀”問題。

（三）加強全球“華語體驗”文本的文化翻譯

我們當前的文化正經歷著許多欣喜、迷茫、尷尬和痛苦。張富貴在《全球化時代與現代公民意識的確立》一文中這樣寫道：“對於中國來說，全球化時代應該是一個整體轉換的時代，是近百年來從被動現代化向主動現代化轉換的過程”。^⑧然而這個轉換的過程是漫長的，而代價也是

沉重的。這一點，只要看看我們今天傳統文化遭遇的尷尬、大學教育經受的迷茫、人文精神無奈的失落，以及少數民族生存空間的壓縮、民族文化身份的裂變、國民心理空間的殘破，我們就不難想像，要找到符合我們言說和發展的平衡點，在批判西方政治經濟文化霸權、反思我們傳統文化束縛、警惕“中國人也開始殖民非洲”等言說的同時，進而構建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後殖民文化翻譯研究空間和體系，真是任重而道遠。本人認為，我們可以採用的另一個策略就是，加強有關全球“華語體驗”（The Chinese Experience）文本的文化翻譯。這也是一個發展文化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問題。安德列·勒夫弗爾（André Lefevere）曾指出，文本翻譯通常受制於權利關係的調控，其目的在於構建一個被譯文化（source culture）的“圖像”，以便可以保留或延伸主流群體相對於它者的霸權地位。⁹因此，我們在文本的選擇、閱讀、翻譯、評論各方面都要有某種程度的文化“叛逆”。加拿大籍華人作家LAIWAN寫過這樣一首中英雙語詩“殖民化了的文化”（*The Imperialism of Syntax*）。此詩中英文各25行，中文如下：

戰爭，鴉片，貧窮的動亂 // 迫使你離開了祖國。 // 現在面對著這塊土地，它將限制你 // 長途跋涉後踏上它的國土， // 歸屬別人的語言， // 別人的句法。 // 很快，那些語法的歸戒使你 // 忘了自己。 // 生硬的發音， // 成了讓人奚落的笑料。 // 強咽舌上新文化的苦澀， // 為了生存， // 得證明你的同化， // 證實自我的消失。 // 現在你在這兒 // 還記得你的句法，你的語言？ // 它們本應使你記住自我的存在。 // 這兒 / 當有人要你 // 回到你來的地方去， // 告訴他：你也走你的。 // 這塊土地 // 沒人能染指 // 沒人能佔有 // 然而卻這樣發生了。 // 力量來自於刻苦奮鬥的生活。¹⁰

此詩也許能刺激我們反思自己與“他人”、西方與東方、殖民與後殖民語境、漢人與“少數”民族的文化身份、處境和融合等命題。我個人認為，國人在全球化一本土化語境中對歐美文本進行文化翻譯時，是應該正視並探討歐美民族中心主義及其複製和“它文化”的抵抗這些問題的。不然，美國式的全球文化一體化將帶來人類文化的單調和沒落，“東方主義”的文化思維將故伎重演，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自身的立場和身份。這裡我舉兩個例子：（1）上海：上海是個複雜的文化符號，許多人（包括西方人）很懷念其二十世紀“輝煌的東方巴黎”時代。張藝謀也曾試圖通過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來再現它的昔日魅力。我認為，“大上海”過去是或現在是或將來是一個“國際城市”，但如果它不首先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東方的一個城市，也許它就什麼也不是了，儘管很多人至今為這個所謂的“東方巴黎”自豪又魂牽夢繞。（2）莫言：2012年最讓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名字可能要數“莫言”了。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全世界華人為之歡呼雀躍。雖然莫言的獲獎並非意味著中國文學文化已被地球村的所有“村民”完全接受，但莫言眾多作品所體現的文學品格、文化內涵、人文關懷及漢語言文字的美麗和魅力卻是有目共睹、舉世公認的。獲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已成為或將要成為“世界的莫言”甚至“人類的莫言”，但他首先是“中國的莫言”、“山東的莫言”、“高密（東北鄉）的莫言”。無論如何，他不應當是“中國的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納”或“中國的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或“中國當代的魯迅”。雖然莫言的寫作手法和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受過這三位大師或其他作家的影響，但莫言就是莫言自己——一個有中國文化獨特氣質和敘事風格的莫言，而文化翻譯研究最應關注的就是翻譯過程中如何再現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有中國文化獨特氣質和敘事風格的莫言。

（四）儘快建立有特色的文化翻譯研究，拓寬我們關注和言說的空間

具有高度審視意識的文化翻譯研究，不只是為本文化尋找一面鏡子，從而使其社會道德、價

值信仰、真理標準相對化；同時，我們通過對異文化的觀察思考，對霸權和神話的解構，在新的“全球化一本地化”語境中豐富和更新自己的文化。但須記住的是，“任何屬性皆構建於差異之上，它與差異政治共存亡”。^⑨我認為，要建立有特色的文化翻譯研究，首先要消除偏見，充分認識翻譯是一種複雜的創造性文化“勞動”。儘管翻譯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突出貢獻，卻被文學史家和文化管理部門忽視。當我們面對這種現狀時，應十分認真地進一步探討文化翻譯的性質和歸屬，公正客觀地反映文化翻譯工作者的翻譯思想、理論主張、翻譯活動和成就，真正承認翻譯家的創作地位和文化翻譯研究的學術地位。其次，要發展一種健康、公正、專業的譯評風尚。每部譯作應有見解獨到、言之有物的“前言”或“譯後記”或“序”或“跋”；各級翻譯家協會更應該組織形式多樣的翻譯文化研討會，出版更多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論著，以便給讀者提供新的甚至“另類”的聲音，創造新的甚至“另類”的文化翻譯研究空間。

本人認為，被當前主流翻譯研究忽略的極其重要的文化翻譯空間是強大的、無處不在的互聯網虛擬空間。由於我們主流紙質媒體的運營機制和媒體本身受時間、空間和其他物理因素制約的原因，數以千萬計的觀點鮮明、視角獨到的文本（如文學作品、文化評論、影視作品）在互聯網上飛速傳播。有些文本在數小時內的點擊就達幾十萬甚至數百萬次，其“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遠勝任何紙質文本。如果我們想拓寬文化翻譯的關注和言說空間的話，就必須提升自己的中西/中外跨文化交流意識，積極利用互聯網所提供的各種平臺，努力介入深層次語言文字和文化的交際、協商與論爭。

近幾年來，有一首在全球華人圈子引起哄動的英文詩“*What Do You Really Want from Us?*”這首“給西方的詩”《你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發表於2008年5月18日《華盛頓郵報》，現摘抄數行譯為中文：

我們被稱作東亞病夫時，你視我們為“黃禍”；
我們被預言是下一個超級大國，你說我們是“威脅”。
我們閉關鎖國時，你走私鴉片來強奪市場；
我們風雨飄搖時，你鐵蹄踏來要求瓜分（中國）的機會平等；
我們擁抱自由貿易，你罵我們搶走你的飯碗。

.....

當我們人口達到十億，你說我們正在摧毀地球；
我們限制人口增長，你說我們在踐踏人權。
那時我們一貧如洗，你視我們賤如豬狗；
我們有鈔票借給你，你怨我們令你債臺高筑。
我們發展工業，你說我們污染環境；
我們有貨品賣給你，你說我們讓地球暖化。

.....

你為何這樣恨我們？我們想知道。

“不”，你說，“我不恨你們。”

我們也不恨你；只是，你真瞭解我們嗎？

“當然瞭解”，你說。

“我們信息多多，既有AFP、CNN、還有BBC……”

真的，你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

回答之前，請你仔細想想……因為你的機會不是無限的。

夠了……這個世界已容不下更多的偽善。

我們要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盛世太平。

這個廣袤的藍色地球，容得下我們所有的人。

這位作者表達的是整個中華民族多年來積壓的憤慨和無法表達的心聲：以前國弱受盡列強欺凌，今天好不容易開始崛起卻又受西方的敵視，中國人似乎做甚麼都不對，都得不到西方的理解和認同，你們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這首詩反映了“全球化—本地化”時代華人的心態，抒發了華人長期以來的集體壓抑、疑惑和對新的文化身份的追求。其實，西方某些人對中國的無端敵意和扭曲的心態，原因很複雜，包括中國國際地位的飛速提升，“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文化優越感，也有我們自身的心理缺失及經濟高速發展中的浮躁和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貪婪，同時也有西方人的種族歧視、歷史成見、利益衝突以至害怕中國軟硬實力的強大等等因素。互聯網是中西文化交往的重要平臺和橋樑，如何促進我們與他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溝通，這首詩值得我們認真閱讀和思考。

選擇翻譯並傳播這樣的文本是“全球化—本地化”後殖民語境中文化翻譯的一種抵抗策略、路徑和模式。這似乎與史碧瓦克（Gayatri C. Spivak）所倡導的翻譯應是轉換式改造這一主張相吻合。^⑥文化翻譯是不同種族間難度最大但最觸及靈魂的溝通方式，因為文化翻譯的終極目標不僅是幫助一個民族構建、協調、整合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身份，而且從根本上糾正甚至挑戰他人對自己的歷史誤讀和文化偏見。也就是說，文化翻譯在跨文化交流的宏觀層面上統領譯文走向，又在語言轉換的微觀層面上理解和再現源語言文本的文化內涵。我們再以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為例，他的獲獎，除了其作品本身的文學品格、人文關懷及漢語言文字的功力之外，我認為，美國著名漢學家、文學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對其主要作品（如《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師傅越來越幽默》、《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變》等等）的高質量的英譯功不可沒。葛氏的英文翻譯不僅語言流暢、生動、傳神，而且對莫言作品裡展示的曲折的當代中國歷史、複雜的社會現實、豐富的文化內涵、草根的人文精神和獨特的寫作風格皆有十分精准的理解和揮灑自如的再現。如果沒有葛氏這種嫺熟的深層次的文化掌控，那些譯作將是蒼白的外來故事，注定缺少中國文化之精氣。

結語

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翻譯不僅僅是在兩種語言文字所構建的空間裡獲得美感與快樂，而且也是一項複雜的跨文化活動：是兩種文化、兩種意識、兩個價值系統、兩個靈魂的對話。這一複雜的創造性活動不僅要求我們具備較強的中文和外文基本功^⑦，熟悉兩種文化的異同，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要有相當強烈的歷史感，對由發達的市場經濟推動、時刻散發出歐美民族中心主義的西方文化，要有客觀冷靜的審視意識。我本人並沒有迷戀所謂“高雅文化”的懷舊情節，但像傅雷、楊絳、查良鏞、王道乾、楊憲益等先生那樣文學素質和自尊都同樣傑出的翻譯家，當代的中國似乎擁有太少。他們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夫，對現代漢語韻律的感覺、把握和表現，至今無人可比。^⑧當然令人不必過分傷感的是，我們仍有很多翻譯者在兢兢業業地耕耘這片豐富多彩、疆界模糊的文化沃土。不論是對我們在西方現代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從事翻譯而且碩果累累的過去，還是對在這個高唱“推翻”典範、“打倒”傳統、“消解”理性、“對抗”

中心，即劉再復所謂“放逐諸神”、“告別革命”的後現代，或是在提高警惕、抵抗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後殖民文化語境裡繼續翻譯的今天，我們對外國（尤其是西方）文化及其產品更應該有一種審視意識和一套有效的策略。也就是說，在文化翻譯研究中，我們要不卑不亢，學習他人，以豐富自我的生命體驗。只有這樣，我們方能在二十一世紀建立一個更強健勃發、更自由民主、更智慧大氣的現代中華人格。

總之，我們應在擁抱後殖民新時代所倡導的“多元文化”的同時，警惕各種話語霸權，防止文化和批評層面上的“失聲”，努力把握好“全球化一本土化”語境中作為抵抗的文化翻譯。

-
- ① Friedman, 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9, p. 309.
- ② Robertson, Roland,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p. 25-44.
- ③ 丁仁方：《全球化與新地方主義》，台北：《國政評論》，2002年。
- ④ Flournoy, D. M. and Robert K. Stewart, *CNN Making News in the Global Market*, Luton: John Libbey Media, 1997.
- ⑤ 張學昕：《“全球化”我們的文化選擇》，北京：《文藝報》，2001年9月10日。
- ⑥ 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11頁。
- ⑦ 部分認同翻譯學“文化轉向”的學者認為，全球化時代的翻譯功能發生了“從文字翻譯到文化釋義”的大轉變。參看 Wang Ning,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s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edited by Wang Ning and Sun Yifeng,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Clevedon: Buffalo and Toronto, 2008, p.75.
- ⑧ 王嶽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0頁。
- ⑨ 何新曾指出，現在世界上八十多個國家陷入巨額債務。四十來個國家還不起債，十七個國家由於負債特別嚴重，國民經濟瀕臨破產。讓人深思的是，世界上的資金並不是由富國流向窮國，而是由窮國流向富國，平均每年的淨流出額達500億美元，流向是美國、西歐、日本。這“既可以說明自80年
- 代以來，許多不發達國家儘管實現了工業化（如拉美國家），卻何以比以前更窮；又可以說明發達國家富裕的源泉究竟何在。”（何新：《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7～120頁）今天的歐美更是債務累累，殃及全球。
- ⑩ 何新：《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第495頁。
- ⑪ 《中國還是能說不》的作者宋強等指出，“一旦我們以勤勞和真誠再度進入規則時，我們發現這些規則對我們的歧見因鴻溝的擴大而加深了，而且亞非拉知識分子、經濟界人士和政治家最大的發現是：這種規則的狼性——即吞食弱小者的利益以壯大國際資本、維護少數國家的領先優勢，已經不再是吞吞吐吐羞以道破的秘密了”。參見宋強等：《中國還是能說不》，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17頁。
- ⑫ 席柏爾（John Silber）：《希望與絕望：一個視點的問題》，在“西元二千年研討會”上的演講，張蓉譯，香港：《明報月刊》，1998年1月號。
- ⑬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with a new afterwor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p. 347.
- ⑭ Mao, Sihui, *Translating Popular Culture*, in *Translation,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s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p. 172; Cheung, Martha P.Y., *Chinese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 Vol 15, No. 2,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9, p. 225.
- ⑮ 中國人權研究會：《〈曼谷宣言〉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權文件》，北京：《人民日報》，2005年4月8日。
- ⑯⑰ 樂黛雲：《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載樂黛雲、勒·比雄主編：《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108~112 頁。

⑱張富貴：《全球化時代與現代公民意識的確立》，廣州：《粵海風》，2004 年第 4 期。

⑲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in Susan Bassnett and A.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15-27.

⑳ Lee, Bennett & Jim Wong-Chu (eds), *Many-Mouthed Birds: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 Vancouver/ Toronto: Douglas & McIntyre, 1991, pp. 57-58.

㉑霍爾 (Stuart Hall) 的原話是：“All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across difference and begins to live with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參見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in *Identity: The Real Me*, ICA Documents 6,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987, pp. 44-46.

㉒ Mark Sander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Live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6, p. 34.

㉓劉宓慶提出克服翻譯的客觀制約性的三種能力：分析—綜合能力，應變—對策能力，表述—行文能力。詳見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第 62~63、304~313 頁。

㉔我很贊同王小波的看法，“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參見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園》，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第 143 頁。

參考文獻：

[1] 劉再復：《放逐諸神：文論提綱和文學史重評》，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4 年。

[2] 羅馬俱樂部：《共建新世紀》，香港：博益出版集團，1992 年。

[3] 孫隆基：《未斷奶的民族》，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5 年。

[4] 陶東風：《當代壯學與文化研究的“後現代”誤區》，廣州：《學術研究》，1994 年第 2 期。

[5] Bassnett, Susan and A.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assell: London, 1990.

[6] Foucault, Michel,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en, Harvester Press, Brighton, Sussex, 1980.

[7] Sardar Ziaudd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Other: The New Imperialism of Western Culture*, London & Chicago: Pluto Press, 1998.

[8]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from U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8th 2008.

作者簡介：毛思慧，澳門理工學院貝爾英語中心主任、教授，國際譯聯理事，中國中美比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責任編輯 陳志雄]